

顺应论视阈下的口译理解研究

伍永花¹, 崔化²

(1.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2; 2.中国矿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顺应论认为语言行为的本质是选择和顺应,理解是选择的前提,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性在不断理解和选择的过程中突出出来。同时,因为语言本身的特性和交际需要,理解和选择受到了语言客体和交际语境的制约。顺应论视阈下的口译理解研究注重语境关系的动态顺应和语言结构的动态选择,强调译员可以能动、灵活地采取一定的策略促进对源语的准确性理解,凸显了译员的主体性。

关键词:顺应论;口译理解;语境关系;动态顺应;语言结构;动态选择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8X(2016)03-0047-05

DOI: 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6.03.009

引言

顺应论认为语言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的特征使人们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进行选择。因为,变异性提供了语言选择的可能范围;协商性突出了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性,他可以有意识地、能动地根据灵活的原则和策略做出选择;顺应性则使语言使用者的选择有了语境制约性因素,让语言使用者从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从而满足交际需要^{[1]55-63}。因此,顺应论揭示了语言行为的本质——选择和顺应,强调使用语言过程的动态性和选择性。

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理解是选择的前提,是将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操作结合起来的入口。有了理解,才能有语言行为的顺利展开,口译理解也不例外。从口译过程的角度来看,口译可大致分为理解、记忆、转换、表达四个阶段。理解“作为口译过程的初始步骤,对口译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2]16}。仲伟合认为,口译过程是一个“解码——换码——编码”的认知操作过程^{[3]19}。那么,口译理

收稿日期:2016-04-14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顺应论视阈下的口译教学模式研究”(2015SJD312)。

作者简介:伍永花(1981—),女,河南商丘人,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崔化(1978—),男,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解便是对源语的解码,它直接影响着接下来的换码和编码过程。顺应论视阈下的口译理解注重理解过程的协商性、顺应性和选择性,突出了语境关系和语言结构客体的重要性,同时彰显了译员在理解的顺应选择过程中主体性作用。

一、口译理解研究概述

口译理解研究源自于口译教学实践的需要。目前的国内口译教学多受到以 Seleskovitch 为代表的释意派研究范式的影响,强调“释意”这一模因,即把口译看成意义的交流活动而非语言的转换活动。因此,国内诸多口译教材都将得“意”忘“形”作为对学生听辨理解训练的要求,如任文主编的全国翻译硕士系列教材《交替传译》,李长栓著的《理解与表达:英汉口译案例讲评》等。“释意”即对源语的理解,换句话说,口译理解在口译教学中举足轻重。同时,从口译课堂教学实践来看,相当一部分学生会因为自身语言知识的制约无法很好地理解英译汉部分的源语,从而影响整个口译效果。另一部分学生则因为习惯于“单词化”或“孤立化”理解,造成无法理解源语或者翻译痕迹过重,甚至曲解源语意思。因此,对口译理解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学生理解过程的困扰,从而更加促进教学实践水平的提高。

对口译理解研究阐释较多的以下述三位为代表。Pochhacker 从心理语言学的语言处理方式入手,认为口译理解可以分为两类,即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前者受源语驱动(input-driven),是被动的、消极的;后者以知识结构为基础,是主动的、积极的^{[4]118}。这一视角下的口译理解依赖于译员已有的知识结构——词法、句法、语用、百科知识等。以 Seleskovitch 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的“释意理论研究范式”强调对口译过程的认知分析,而理解是认知科学研究的首要议题。Seleskovitch 认为,意义有两部分构成,一是源语音音唤起的意义,一是源语言意义的认知附加。但释意派强调意义是脱离源语言而形成的^{[5]333-341}。这意味着,释意派视角下的口译理解研究是脱离源语外壳而依赖于译员知识结构的“非言语化”(language-free)行为。另一位对口译认知及口译理解研究有重大影响的是 Gile 提出口译理解等式: $C(\text{comprehension})=KL(\text{linguistic knowledge})+ELK(\text{Extra-linguistic knowledge})+A(\text{analysis})$ ^{[6]118}。也就是说,口译理解是译员语言知识、言外知识、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这意味着,口译理解离不开语言和认知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口译理解研究为口译过程的开始提供了理论指导。那么,译员该如何利用语境关系和自身的语言知识实现对源语的理解?顺应论从语境关系的动态顺应和语言结构的动态选择两个方面做出了回答。

二、口译理解——语境关系的动态顺应

作为一种具有不可预测性的即席双语交际活动,口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即使在大方向既定的交际场合,话题内容也可能千变万化,发话人的语言、语码、语体、风格都可能在变化。因此,口译行为是一种“动态行为,交际环境处于动态之中,译员的理解和表达也处于动态之中”^{[7]54}。其次,语言顺应性的特征也促使语言使用者开始思考,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语言理解和选择到底在和什么构成顺应关系,即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或者影响了人们的语言理解和语言选择。维索尔论认为,是语境因素,即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因素在影响着语言使用者的理解和选择,因为“语言使用者总是置身于某一复杂背景中,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该背景发生联系”^{[8]88}。因此,口译理解始终处在一个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不断变化的动态语境中。在这样的动态语境中,发话人在发言时做出语言产出性选择,译员在口译时做出理解性语言选择。口译行为的交际成功,是因为交际主体,即发话人(Utterer)、译员(Interpreter)和听众(Audience)在理解同一话语文本时,其语境关系因素都有所“重合”(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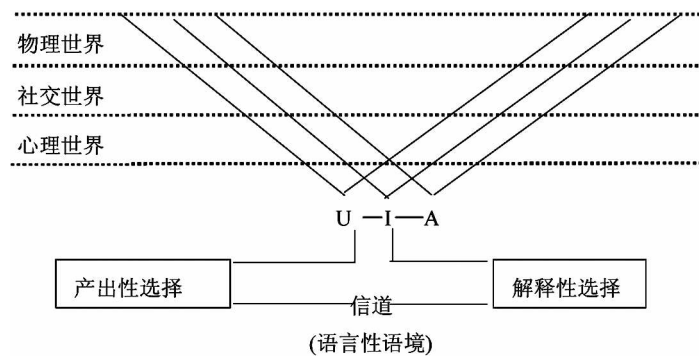


图1 顺应论视阈下的口译理解

维索尔论认为,影响语言使用者选择、顺应的交际语境因素包括心智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心智世界包含语言使用者的愿望、动机或意图等,概括为交际主体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认知因素以种种概念化的形式提供沟通心智世界和社交世界的桥梁,解释社会性互动;而情感因素提供的桥梁,则是一些通常在诸如感动(affect)、投入(involverment)这类标签下研究过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互动的态度性前提^{[8]104}。

在口译实践中,发话人和听众处于不同的心智世界中,作为沟通桥梁的译员对源语的理解首先要顺应发话人的认知和情感语境,构成互动性顺应;其次要顺应听众的认知和情感语境,从而完成解释社会性互动。以译员对“精神文明”一词的汉英口译为为例,对源语发话人而言,它传达的是一种健康积极的追求文化享受的生活方式。然而,它曾被译为“spiritual civilization”。而“spirit”传达给英语听众的信息是“幽灵、鬼魂、精神、神灵、灵魂等,而且宗教意味很浓”^{[9]65-68}。显然,这与源语发话人想传达的意义不符,因此在中共十七大之后,这种译文就被淘汰了。其根本原因在于译员理解时就没有顺应发话人的认知语境,从而在语言选择时直接将其逐字译成“spirit”。除了认知语境的动态顺应以外,译员的理解还要动态顺应交际主体的情感语境。以译员对外宣场合常出现的“台独”的翻译为例,曾经有段时间,它被译成“Taiwan Independence”。然而,站在中文发话人的角度来说,“台独”是不可接受的,是贬义的。而“independence”的英文理解是“political freedom from control by the government of another country”,所以它是褒义的。比如美国人用这个词说自己的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因此,把“台独”译成“Taiwan Independence”是绝大多数中文源语听众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的,反而却迎合了少数“台独”支持者的情感语境。所以,现在译“台独”时,就选择“Taiwan Secession”^{[10]98}。美国人在描述美国内战南方各州的行径时也是用的这个词,它不只是指脱离一个国家,更强调对国家的背叛。因此,只有当译员的理解顺应了反对“台独”的源语听众的情感语境时,才能够选择准确的译语,这是交际主体互动的态度性前提。

影响语言使用者选择、顺应的社交世界因素多和社会场景(social settings)或公共制度(institutions)有着根本的联系。文化,一直都是最能反映社交世界与语言选择关系的因素^{[2]91-92}。

口译不是简单地译出发话人所说的内涵意义(denotation)或者字典意义、语法意义就可以的,不同的社会场景或者文化会赋予语言一定的外延意义(connotation)或者交际意义。译员要明白,发话人和听众可能处于不同的社交世界中,对发话人特定词条或语句的语法意义理解和语言选择未必能在听众中产生对等的理解效果。比如,把“馒头”、“饺子”译成“steamed bread”、“dumplings”,把中国人接受别人赞美时说的“哪里哪里”,送人时说的“您慢走”译成“where, where”,“You walk slowly”,都是只顾及语法意义理解而忽视交际意义理解的失败案例。对目标语听众而言,“steamed bread”的意思是把他们经常食用的面包再蒸一下;“dumplings”指的是任何有馅的食物,因此包子和馄饨也可以称之为“dumplings”。从根本上来说,是译员的理解忽略了和语言选择构成相互顺应的社交世界因素。同样,中文的“哪里哪里”、“您慢走”,更多的是一种谦虚或者礼貌上的问候,译员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字面意义,更要顾及其跨文化交际意义。因此,译成“Thank you”、“Take care”则更能

顺应目标语听众的社交语境。

最后,影响语言使用者选择、顺应的物理世界因素强调语言使用者时空位置的相对性在决定部分语言选择时的重要性^{[8]101-116}。因为口译的现场性、即时性、不可预测性,译员一直处于强度高、压力大的工作状态下。所以,译员往往会使用未经深思熟虑的临时应对词语来表达转瞬即逝的语言内容^{[11]8},这就有可能造成译员的理解性失误,甚至出现一时无法理解或误解,从而无法译出、漏译、错译某些信息的情况。口译的转瞬即逝使译员很难对这种失误进行补救,而物理世界时空因素的相对性则为译员的补救提供了可能性。把看似绝对的时空概念做相对性的延续处理拓宽了口译理解的时空长度和宽度。这意味着译员可以在后来合适的时间和空间里,对前面不译、漏译或者错译的信息进行补充性口译,从而促使交际行为的成功。

三、口译理解——语言结构的动态选择

在口译教学中,还经常出现学生因为纠结于一个生词的意义而无法理解整句话,或者因为一时反应不过来某几个语音或词组而无法理解整段话的现象。译员习惯于先听清楚语音,理解单词意思再去口译的被动模式。口译理解本身被“语音化”、“单词化”或“孤立化”,译员完全丧失了其理解的主体性地位。

顺应论视角下,语言的顺应性使译员首先在语言输入结构层面上走出了原来“单词化”的狭隘范围。这里的语言结构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宏观至语码、语体的顺应选择,微观至话语建构的全部要素(从语音结构、词素和词、小句和句子到命题结构及各种超句单位)。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不能把处在不同层面上的结构,简单地看作一个按线性顺序排列起来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的集合,而应该是联系语言理解和选择的需要对语言结构加以考虑。换句话说,“语言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为语言使用者提供了一系列语言形式,包括各种语音、词汇和句法形式。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决定了他对这一形式的掌握,但选择哪一种形式则是由语言使用者根据交际时的情况而定”^{[12]21}。所以,涉及到语言层面的译员口译理解不应该只局限于“单词化”的意义理解,而应根据交际需要对语言结构动态地加以选择。

从语言结构的动态性顺应来看发话人和译员的变化。发话人所建构的意义不再是简单的语音、单词、句子等要素的线性集合体,而是联系语境和语言选择需要建构的以“命题”为单位的意义模块。译员则根据实际情况和语境需要能动地理解这些意义模块而不是孤立化的语词,因为听众的信息接收并不只是对译员的语音、单词或语句的线性集合接收,而是联系语境选择和自身需要完成对全部或者部分意义模块信息的接收。这种模块化的信息理解方式有利于减轻译员大脑和笔记工作量,提高信息提取速度,而语言结构的顺应性和动态选择使之成为可能。

四、结语

理解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前者强调整理解的结果,后者则重视理解的过程性。顺应论视阈下的口译理解注重译员理解过程的动态性,因为理解过程中译员的认知语境、交际语境不是既定的,而是随着交际过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理解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前者突出了文本的客观性,后者则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论下视阈的口译理解彰显了译员的主体性,译员可以能动地、灵活地采取一定策略,根据交际需要对语言结构动态加以选择,以促进理解过程的完成。

参考文献:

- [1]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2] 仲伟合, 王斌华. 基础口译[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3] 仲伟合. 口译教学刍议[J]. 中国翻译, 1998(5): 18-21.
- [4] Franz, Pochhacker.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 [5] Seleskovitch, D.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 In D. Gerver & H.W. Sinaiko (eds)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Plenum Press, 1978.
- [6]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7] 马霞. 口译: 选择、协商与顺应——顺应论的语境关系在口译中的应用[J]. 中国翻译, 2006, 27(3): 53-57.
- [8] 耶夫·维索尔论. 语用学诠释[M]. 钱冠连, 霍永寿,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9] 李瑟, 郭云海, 刘伟. 关于政治词汇的汉英翻译文体[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 65-68.
- [10] 伍永花. 顺应论视角下的党政工作报告英译研究[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0, 24(7): 96-99.
- [11] 任文. 交替传译[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12] 龚龙生. 顺应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调查分析[J]. 外语电化教学, 2010(133): 21-24.

Study on Interpreting Compreh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ation Theory

WU Yong-hua¹, CUI Hua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Nanjing, Nanjing Jiangsu 211172,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000, China)

Abstract: Adaptation theory believes that language use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linguistic choices and adaptation based on comprehension. Subsequently, language users' subjectivity plays a key role. Meanwhile, because of intrinsic trait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eeds, comprehension and choices are subjective to language itself and context. Interpreting comprehension from adaptation theory focuses on dynamic contextual adaptation and dynamic structural objects choice, stressing interpreters' subjectivity.

Key words: adaptation theory; interpreting comprehension; dynamic contextual adaptation; dynamic structural objects choice

(责任编辑 田 军)